



# 翰林外史

## 钟开莱教授逸传

沈诞琦

这个暑假<sup>1</sup>在普林斯顿跟 Erhan Çinlar 教授做研究。他是世界一流的概率学家，尤其在马尔可夫链和泊松过程这两个专题上建树颇多。他在普林斯顿联合创建了世界上唯一的运筹和金融工程系，使得他在这一领域的教育和研究走在世界前列。他曾是我概率课的教授，因为这个关系得以央求他收我做暑假研究。当初面试我时，他在最后问了一句，“对了，你有没有听说过 Kai Lai Chung？”他就在一张白纸上写下这几个英语字母。我说，没听说过。他愣了一愣，“奇怪了，他告诉我他在中国还

是挺有名的啊。”

到了6月2日我们正式开始做课题，第一天见面，Çinlar 教授问我的第一句话是，“你真没听说过 Kai Lai Chung？”我又摇了摇头。他说，“唉，Chung 昨天过世了。我和他认识四十多年了。”Çinlar 教授并没有显得特别悲伤，只是沉默了几秒，就开始布置课题的相关任务。

接连两次提到这个人名，我对这个 Kai Lai Chung 产生了好奇，去 google 搜索了一下。只怪两个拼音系统产生的混淆，这 Kai Lai Chung 就是国际著名的概率学家钟开莱先生。今天又见 Çinlar 教授的时候，我便说，的确知道钟开莱这个人，我和他都是上海人嘛。他一下子来了

<sup>1</sup> 本文写于 2010 年——编者注



普林斯顿大学概率学家 Erhan Çinlar 教授

兴趣，指了指桌上的两大格文件夹，“喏，这都是我四十年和钟开莱的通信。”他随便翻阅了几封，都是手写的白纸黑字，有的是聊家常，有的是讨论共同的朋友，有的是研究学术问题。早年的信件，钟开莱教授的英文手写潦草而优美，用细密的圆珠笔和钢笔书写。后来的信件上的字体，渐渐地粗了，大了，用记号笔书写，一笔一划像小孩子在练字，甚至有两行写到后面交叉在一起，模糊不可认。Çinlar 说，那是因为钟开莱晚年受眼疾困扰，最后两年几近失明。他指了指一封信，他说，“你看这里，开莱不写 of me，一定要写 of moi，还有，还有这里，不写 my，一定要写 mon。他平时说话的时候也是这样，一副法国人派头。”他顿了顿，说，“真是个人物啊！”就从这说开去，Çinlar 教授讲了许多关于钟开莱的逸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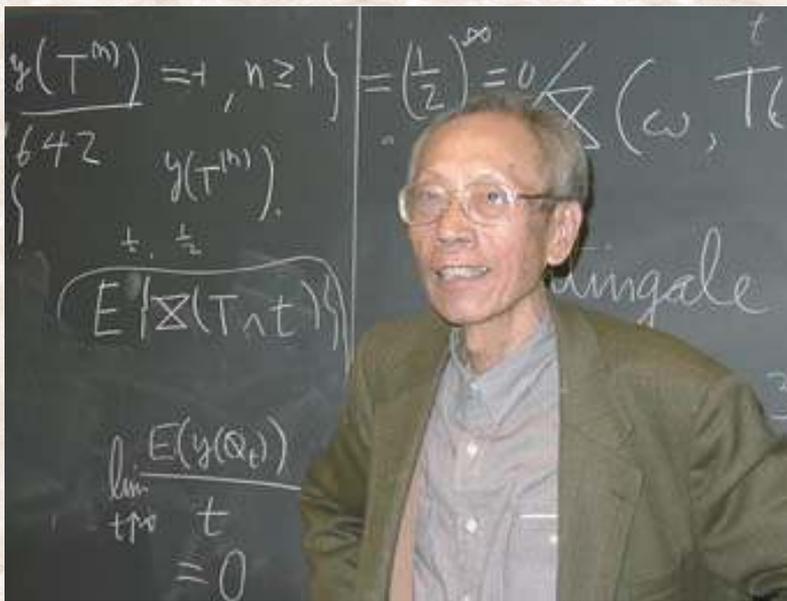
关于钟开莱的生平、学生时代和华罗庚、吴有训等学术巨擘抬杠，这些在百度百科里都有记载。我这里就记录一下 Çinlar 教授亲身经历的或者他听钟开莱亲口所说的一些往事。

1945 年，钟开莱获得庚子赔款公费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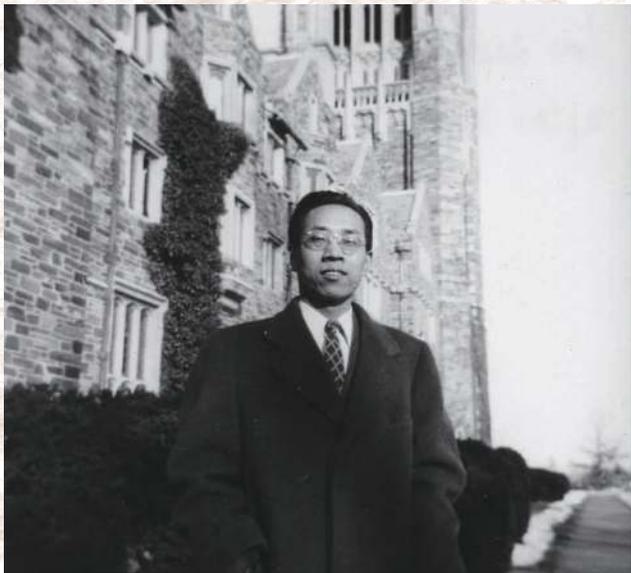
美奖学金到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。到普林斯顿第一天，他就说，“今天是我到美利坚的第一天，我一定要到镇上最好的餐馆大吃一顿！”就这样，他从火车站拖着行李一路走到普林斯顿最好的法式餐馆 Lahiere's。他那么多大包小包，风尘仆仆蓬头垢面，好说歹说才被男侍放进餐馆。到了餐馆，也是天有神助，在那个没有网络没有电视信息闭塞的年代，他竟然一眼就认出了其中一个食客就是 Harald Cramér。Harald Cramér 是当时概率和统计学界的大师，是斯德哥尔摩大学派到普林斯顿的访问学者，也才来普林斯顿没几天。钟开莱就跑到 Cramér 面前，一本正经地介绍自己，共同吃了一顿饭，饭毕之后 Cramér 就成了钟开莱的博士生导师。Cramér 只在普林斯顿呆了两年，两年之后，钟开莱拿到了博士学位，而 Cramér 则回到斯德哥尔摩大学当了校长。

钟开莱成名之后和 Çinlar 参加了许多国际学术会议。有一次在德国柏林的会议，中间休息一次，学者们喝咖啡联络感情。会议的主席是一个新近崭露头角的年轻人，走到钟开莱面前想和他套近乎。那年轻人还没开头，钟开莱就劈头盖脸地骂开了，“主席啊，刚才发言的那个俄罗斯人，讲两句话就要表扬自己，一表扬自己就要大家祝酒，发言一小时祝了十一次酒。我们不能说他，你就不能提醒提醒他吗？真是不开窍。”年轻人彻底懵了。钟开莱不再说话，低头吃蛋糕喝咖啡。过了一会，看到年轻人还没走，突然说，“算了算了，姑且念在蛋糕的份上。啧啧，这德国人真是会做蛋糕啊。”

钟开莱和 Çinlar 共同创办了一系列讨论概率论难题



钟开莱教授



钟开莱 1940 年代于普林斯顿



钟开莱教授和夫人 Lilia Chung

的讲习班，定期在不同的大学举行，还编辑了许多学术刊物。有一期讲习班在钟开莱任教的斯坦福大学，时间定在一个周二的下午。Çınlar 就和钟开莱说，“周二下午斯坦福还有一个统计学大会，很多统计学家肯定两个会议都想来。你不如换个时间吧。”钟开莱击掌笑着说，“我就是特意安排在这个时间的！这样所有的统计学家就来不了我的讲习班啦。我最讨厌统计学家了。”

刚入清华大学时，钟开莱是物理系学生。因为吊儿郎当逃课得罪了吴有训教授，只能转到数学系。到数学系又觉得华罗庚太罗嗦，到普林斯顿之后专攻数学中研究最少的概率论。概率和统计不分家，要做概率上的学问一定要有扎实的统计功底，而钟开莱偏偏又公然宣布自己“最讨厌统计学家”。他把自己能伸展拳脚的范围缩得很小，就是在这样一个鲜有人探索的领域，他打出了一片天地，成了美国概率论界的巨擘。近年来，概率论因为在金融经济领域的应用，迅速成为学术热门。他的概率论著作被专业学术论文引用次数最多，据美国数学会评价，“Chung's writing is literate, elegant, wise, humane. He takes the reader into his confidence, explaining ideas, motivation, and circumstances.”

在 Çınlar 回忆的往事中，不时蹦出一些我从来没听说过的人名。每每我现出疑惑的神情，教授就解释说，“喏，这是当时最聪明的拓扑学家。”“喏，这是当时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院长。”这样的次数多了，他突然笑嘻嘻地说，“诞琦，你一定奇怪我怎么认识那么多名人？实话告诉你，我的朋友全是学术名人。至于开莱啊，他结交的名人就

多了，不但有学术上的，还有政治上和商业上的。他的妻子是菲律宾一个很显赫家族的金千小姐，他的儿子现在在华尔街的一家公司做 CEO。至于公司的名字嘛，嘿嘿，我以后再告诉你吧。”

然后，Çınlar 教授望着书架上的几册书，我知道了，在他的视线中，已经不再有我，也不再有些书，满地全是属于老人的回忆。Çınlar 说，“我第一次遇到开莱，我就知道我们要成为终身的好朋友。真是个人物啊！你知道什么叫人物吗？就是，我有许多话要说，又不敢说，他全部替我说出来了。”

Çınlar 教授的概率论课是我在普林斯顿上过的最难、最幽默，也是收获最大的课程。他总是穿着一身黑色小礼服，白色衬衫黑色领结，在黑板上用优美的花体字写板书。一开始，习惯了 Powerpoint 板书的同学都怨声载道，抱怨看不懂花体字。不久，大家就被这矮小的土耳其老人的幽默所打动了，他的演讲与教科书无关，听了演讲再去看书，多花点思想，常有豁然开朗之感。

暑假课题开始后，每两天就去见 Çınlar 一次，每次，不但是布置新任务，还会告诉我好多有关的趣事。他说，“有一个很傻的广告里，一个女人担心地说，她今天抽了五枝烟，这样下去要得癌了。诞琦，一天抽五支香烟要抽 80 年才刚刚有风险可能得癌啊！我年轻时，那才叫抽烟，一天抽三包，现在不也是好好的？”还有一次，他告诉我为什么蘑菇收藏是世界上最危险的爱好。他说，收藏蘑菇到一定境界，必定要自己到森林里采集中意的蘑菇，这世界上菌菇品种那么多，长得差不多，弄得不好就要出人